

色杀戮

千古奇冤

蘇區紅軍

冤殺

大紀實

周春云 张永春 编著



周春云

张永春

编著

陨落的红星

苏区红军冤杀大纪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 陈

封面设计：刘梁伟

技术设计：高 莉

陨落的红星

周春云 张永春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科技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8 字数 330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012-6/D·515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23.80 元



毛泽东



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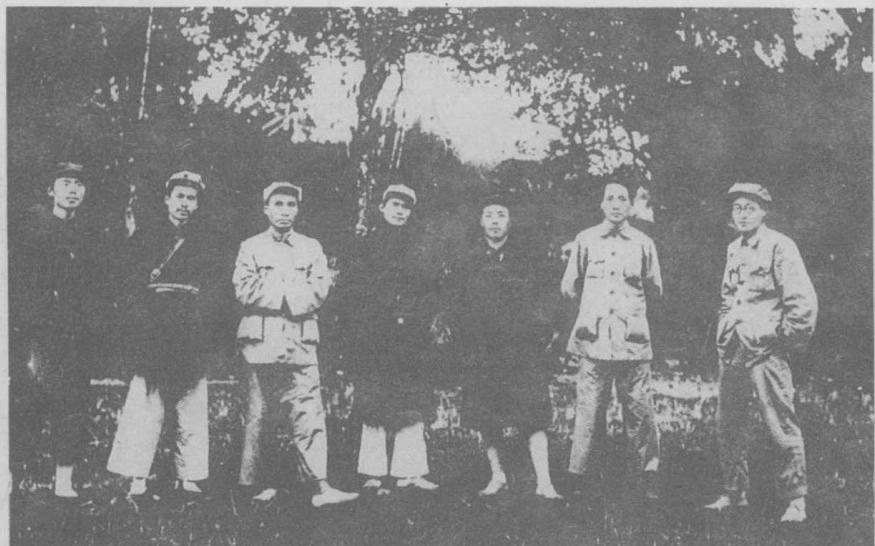
象征革命圣地的井冈山巍巍挺拔在湘赣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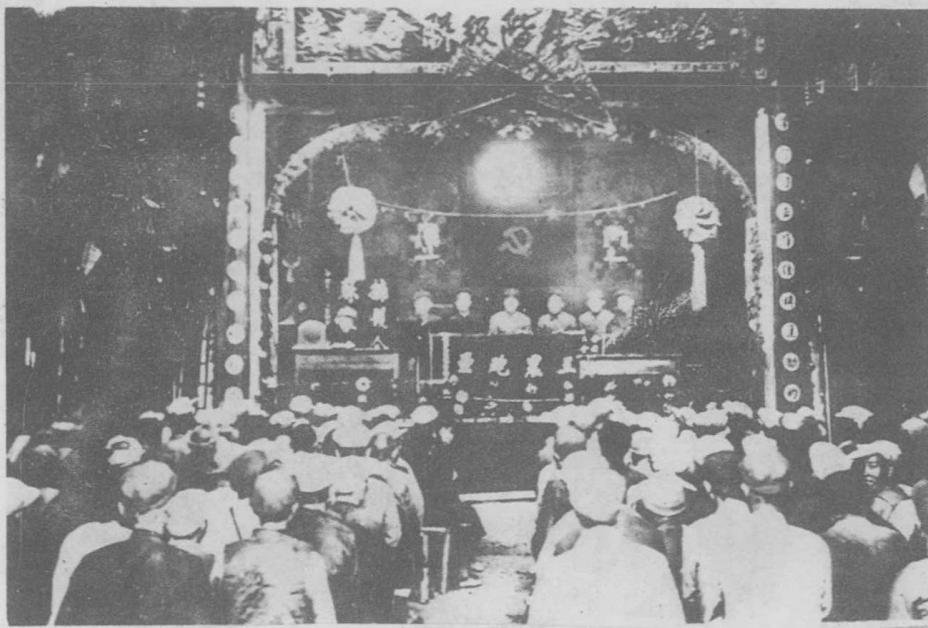
陈毅



贺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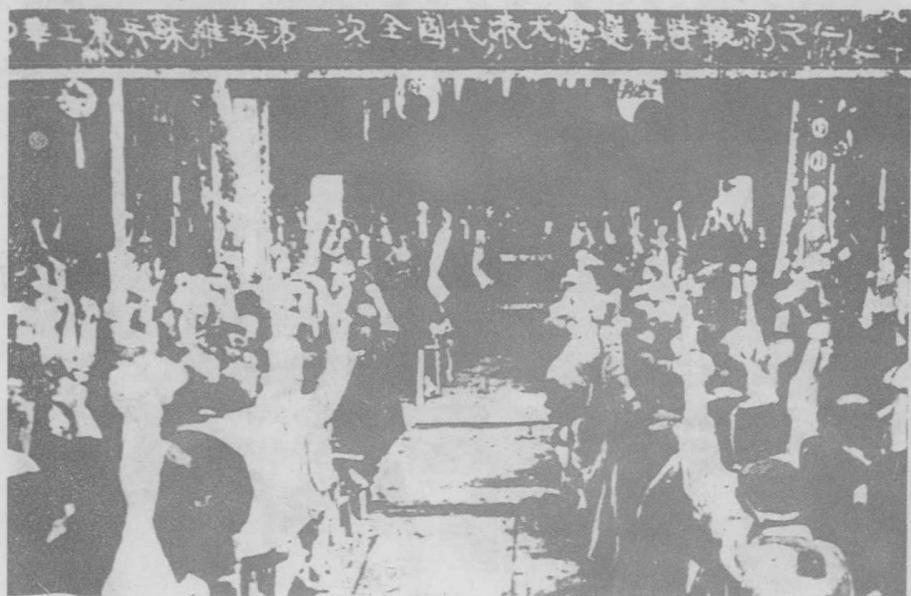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会议对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改组，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并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指责，排除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毛泽东同警卫员合影。左起：毛泽东、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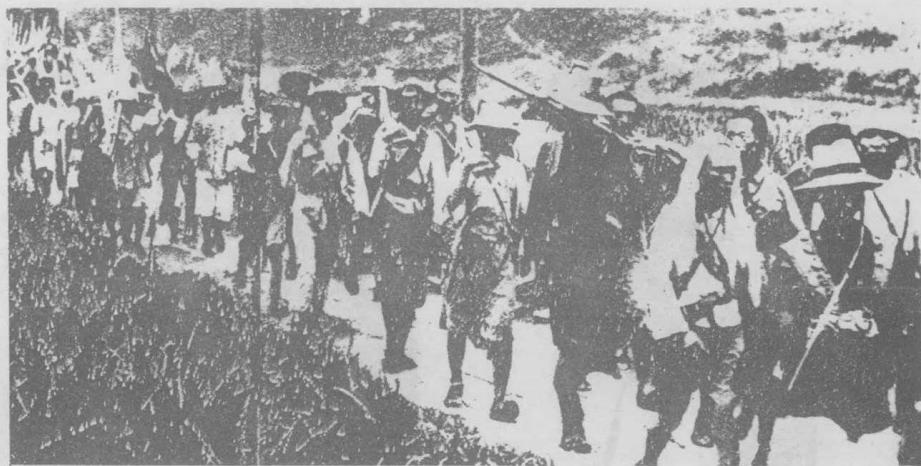
1933年11月，周恩来到达福建建宁县。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王明



张国焘



反“围剿”战争中的红军队伍



1938年毛泽东(左三)和肖劲光(左一)、王稼祥(左二)与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在延安合影



徐向前



早期工运领导人之一邓中夏

党内秘密文件

關於張國泰同志的 錯誤的決定

新了毛澤東同志在一些方面是極少錯的
但他在很多方面都是錯誤的，這就是他的本
質。毛澤東同志是個天才：生性中

的领导，以达远见卓识。他生平重申和倡导
军调委员会中的三原则，以打倒蒋介石或消灭蒋
介石政权为先决条件，立他为过境美属群岛向
他所领导。此外，他以民族主义为主导思想而反
战，参加军调会，特别是中国革命制度和军事的
反映。这使他很快便成为国民党内的和平力量，
从而对世界和平产生良好的影响。

(B)由于馬西亞內志向和機會主義的關係，他對中國文化、文學、藝術有深刻的理解。他對於中央政府的執政、國事、軍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完全知識，而且在這兩方面都有極大的成就。他對於社會公私生活、各類社會問題都有深透的了解。這就是他的一個特點。至於他的思想和政治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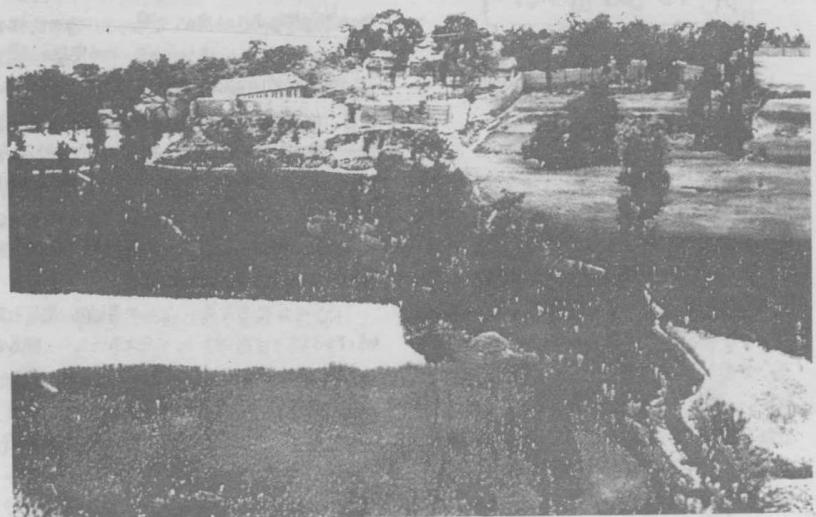
量，馬克思是把社會力量歸為社會生產力，而列寧則進一步把社會生產力、社會關係和社會意識三者統一起來，認為社會生產力是社會關係的決定因素，社會關係是社會生產力的反映，社會意識是社會關係的反映。列寧的社會主義觀點，就是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學說和列寧的社會主義學說，結合蘇聯的實際情況，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總結。

已造成嚴重的局勢，他們要繼續包圍蘇聯為目的，除了對日宣戰之外，公會主委會的幹部，就是他的軍事委員會成員，這一切都是因為日軍侵小日本在蘇聯境內是使蘇聯深感威脅的行動，做蘇聯的主要優勢，因此他不願意加入這個蘇聯的英明計劃工作，他想取回蘇聯和好才會對蘇聯，以保證他在中國的絕對領導地位的，他以為這樣，

（清）王士禛《香祖偶谈》卷之三
王士禛是清初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和书画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生平好古，对宋元以来的书画有深入的研究，著有《香祖偶谈》一书，记录了他对于书画方面的见解和评论。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正午)

(第一块瓦上刻的口头墨迹)



1928年，为创建西北苏区，刘子丹等在陕西渭华起义。
图为起义地点——陕西省华县高塘镇



刘子丹



徐海东

迄今那些已灭亡的革命政党，它们之所以灭亡了，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起来，不知自己力量之所在，因为它们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可是我们不会灭亡，就是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能够学习克服这些弱点。

——弗·伊·列宁

我们需要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真实不应该以它将为谁服务而转移。

——弗·伊·列宁

自我批评——无情的，尖锐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评，是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生气勃勃的阳光和空气。

——罗莎·卢森堡

序 言

由周春云、张永春两位同志撰写的《陨落的红星》，要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导师曹仲彬教授给出版社写了推荐信，由于曹仲彬同志远在吉林省长春市，委托我看过书稿之后，写篇序言。我虽然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对书中所记述的事件也有所了解，但没有专门研究这个课题。因此，在写这篇短文之前除认真看了书稿，还翻阅了一些资料。对个人来说，这是个学习，也是个加深认识的过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在世界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它的发展和胜利，失败和曲折，又是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了解的深化分不开的，同时又是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不开的。

中国革命的历程是辉煌的，但又是艰难曲折的，其间既有胜利的欢欣，也有失败的痛苦；既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惨痛的经验教训。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曲折和挫折呢？这不能不追溯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

共产国际是一个强调集中统一，强调统一行动的组织，中

共是它的一个支部。联共（布）是事实上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往往是从联共（布）党内斗争的需要出发的，而不是从各国党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必然会与别国党的实际情况发生矛盾，给其他国家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危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党内的“左”倾情绪和“左”倾思想还严重存在，中国党面临的任务是继续努力克服这种“左”的错误时，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大反布哈林的右倾，并要求共产国际和中共也把“右倾”和对右倾的“温和态度”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反对，结果导致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对全党的统治。中共的“左”倾错误，在共产国际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狂浪中愈演愈烈，愈反愈“左”，走向极端，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1928年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强调“进攻路线”，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危险”。1929年共产国际第十次执委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第三时期”理论，提出“机会主义份子也在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并且阻挠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连续来了四封信，除陆续强调反右倾之外，特别提出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强调它是“主要危险”，并且提出“打倒一切”的口号。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随着它的路线和政策急剧地向“左”发展，在组织上也日益严重地存在着宗派主义情绪。共产国际不相信各国党的老干部，认为他们不忠于国际路线，因而主张由莫斯科直接培养出来的干部取代他们。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实施这一方针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1930年12

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突然来华，在米夫的策划和操纵下，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宗派集团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打着“反右倾”和反“调和主义”的旗号，通过四中全会，夺取了中共的领导权。1931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了执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右倾危险”过去是主要危险，现阶段仍然是主要危险，而且“在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胜利战斗的整个时期都将是主要危险。”新上台的“左”倾中央，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在中国的特殊的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背叛革命”，这样，就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公平背叛革命”联系了起来，混淆了党内斗争与对敌斗争的界线，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方针制造了“理论”根据，为过火的党内斗争与错误的肃反政策纠缠在一起的严重错误种下了祸根。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鼓动下，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在党内有计划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团，去贯彻“反右倾”斗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并且规定派往各地的“钦差大臣”在政治上要负责向各地党部具体切实地传达贯彻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以来的一切决议案，“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同时在组织上则负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在方法上要具体揭发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两面派，作最残酷地斗争。

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和王明把“反右倾”推向了极端，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声势，形成了可怕的政治压力，因而“反右倾”不仅成为党内错误路线压制正确意见的大棒，而且由于混淆敌我矛盾，“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的帽子满天

飞，使得党内军内，人心惶惶，岌岌可危，不知道哪一天有不同意见或不小心说错话就会成为反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张国焘、夏曦……等人所以能为所欲为，而像段德昌、旷继勋、曾中生、柳直荀等这样一批根据地的创始人、主要领导者，却诬陷为内奸反革命而遭杀害，也就使像李振同、李明瑞这样一些领导宁都起义百色起义，从国民党营垒里分裂出来；坚定地参加红军的将领，也被杀害了。使亲者痛，仇者快，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就连赫赫有名的贺龙、徐向前、陈毅……等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眼看着战友被杀害而无能为力，而且险些自身难保。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对革命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啊！

贺龙回忆说：夏曦“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口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在段德昌领导的机关里刻过油印。”段德昌临刑前，贺龙就在旁边，只能眼噙泪水，记下段德昌的遗言，而毫无办法。持续两年多的大肃反，给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红军从1932年的3万多人，锐减到1934年的3000多人。解散党团组织的结果，使红三军中的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贺龙四个人。洪湖到现在还可以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干部损失最大。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里痛斥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运动，说他任意诬指同志为反革份子，残酷杀害了许多忠于革命并立有战功的好同志。徐帅说：被“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他曾气愤地责问“肃反”负责人：“怎么搞的，把师长

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但是他的抵制和反对很难改变大权在握的张国焘的罪恶决定，结果不到三个月，就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帅在书中愤慨地说：张国焘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张国焘早已忌恨徐帅，由于他的威望，不敢贸然下手，就将他的夫人、共产党员程训宣同志秘密逮捕，刑讯逼供，要她提供徐帅的材料，程训宣坚贞不屈，竟被杀害了。

“富田事变”中执行肃反的那个李韶九，在错杀错捉了大批人之后，又想在陈毅同志这里开刀，要不是陈毅大义凛然的强硬态度，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犯罪，但是他的夫人肖菊英还是被逼死了。要不是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同志在紧急关头识破了阴谋，就会造成一、三军团的分裂，那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肖劲光在回忆闽西肃反问题时说过一段话，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时间，好像遍地都是‘社会民主党’分子。部队中不少官兵被肃去，人人胆战心惊，造成严重的恐怖现象。”

上面我谈了引起肃反扩大化的国际国内缘由，也略举了一些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肃反扩大化的回顾与谴责，目的在于说明当时的肃反确实造成了不同寻常的错误。这在本书里有着更多的资料，更详细的叙述，并且附录了被杀害的烈士小传，我就不去多说了。这本书，文字流畅，有新意，可读性强，值得一读。

我想我们今天出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揭露过去的阴暗面，也不是为了宣染这些过去为人们所不知的事件，更不是为了去猎奇。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总结革命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谨慎，更实在，更符合客观实际，更能够实事求是，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徐向前同志有一段话讲得很深刻，他